

曾

晚 清 巨 人 传

国 王 蕃



主编 / 徐立亭

著者 / 隋丽娟

兼综义理考据辞章
汉宋名士千秋
礼贯治世道
诗教子弟
家书满楼
为政知人善任
谄谀欺饰休
治军逆潮流
黄鹄一舟

哈尔滨出版社

94447

94447
94447

晚清巨人传 徐立亭 主编

曾 国 藩

隋丽娟 著

哈尔滨出版社

责任编辑:姜世栋

王 放

选题策划:王 放

装帧设计:王 卓

晚清巨人传

曾国藩

Zēng Guōfān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黑龙江省五常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 1/32 · 20 印张 · 430 千字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册

ISBN 7-80557-896-6/K · 26 定价:27.00 元

前　言

曾国藩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近百年来，人们对他的评价，从“勋高柱石”的古今完人到“汉奸刽子手”的历史罪人，隔若天渊，判若冰炭。封建地主阶级颂扬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赠以“文正公”的美谥；家族子弟、同僚幕友吹捧他：“器量犹闳”，“非一世之人，千载不常遇之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却声讨他：“以夷狄攻中国”，“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人们从不同的时代要求，不同的政治利益和情感出发，认识曾国藩，形成了此时授以桂冠，彼时斥以恶谥的悬殊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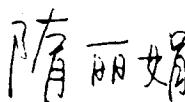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认为，评价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不能借感情，凭义愤，采取简单态度。恩格斯说过：“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反杜林论》）义愤不能代替科学。然而，人们无论对曾国藩的感性认识如何，而在理性认识上都会承认，他是中国历史上不可缺少的政坛巨人。

曾国藩是晚清历史上的关键人物。由于他潜心研究学问，强调认真读书，兼综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不分“汉学”“宋学”门户，而取誉士林；由于他以“慰天下豪杰之理，尽大臣报国之忠”的魄力，奏陈时弊，敢于面对现实，成为具有经世致用

思想的典型代表；由于他投笔从戎，招兵买马，树起天下第一军的旗帜，赢得“中兴名臣”的美誉；由于他首倡洋务，顺应世界潮流，揭开中国近代化的序幕；由于他知人善任，治世有道，教子有方，留下传世家书与为政箴言，引起后人的重视与追寻。

曾国藩是一个颇具魅力的神秘人物。他的神秘不仅来自本身阅历的复杂曲折，也在于以往的封禁。他的业绩举世瞩目，功高震主，行高生谤，引起朝野上下的诽议。嫉贤妒能者有之，兴灾乐祸者有之，千刀万剐者有之，究竟什么原因使他保存自己，幸免吞噬？他一生孜孜不倦，奋笔疾书，无论什么艰险岁月都没有辍笔，卷帙浩繁的《全集》究竟写些什么？他在身后的洪流中大起大落，声名沉浮，也使历史学家眼花缭乱，锢封自禁，迟疑徘徊，甚至长期望而却步。当前，人们怀着无数个疑团，力图解开曾国藩之谜，却一时难找理想的读物，只有争购家书，饱览演义，如同春风梨花，以致洛阳纸贵。时势与读者都渴望有一部系统而完整、严肃而可靠的曾国藩传记，以便寻找真实的谜底。

本书运用了刚刚整理出版的《曾国藩全集》新资料，充分吸收了近年来海峡两岸学术研究的新成果，从史料上、思路上、分量上力图有新的突破。尊重历史，不溢美、不隐恶，实事求是地描述历史环境，让读者能从中得到某些历史的启示，思索中国曾经走过的道路，是本书的主要特点。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方丽娟", consisting of two vertical columns of characters.

1996年3月18日

目 录

| | |
|------------------------------|------|
| 第一章 胸怀大志的青年 | (1) |
| 一、在“衰世”与“经世”氛围里 | (2) |
| 出生在衰落的清王朝..... | (2) |
| 时代对“经世”的呼唤..... | (5) |
| 道咸间的“经世致用” | (6) |
| 二、走科举仕途之路..... | (11) |
| 乡土文化的薰陶..... | (11) |
| 耕读之家的风尚..... | (13) |
| 少年得志的翰林..... | (17) |
| 第二章 京宦十三年 | (22) |
| 一、与师友相砥砺 | (23) |
| 得教于唐鉴 | (23) |
| 受业于倭仁 | (25) |
| 志同道合的朋友 | (28) |
| 二、要集传统文化之大成 | (32) |
| 立志治学的年轻人 | (32) |
| 与众不同的读书之道 | (35) |
| 传统文化最后代表 | (39) |
| 三、仕途顺利的京宦生涯 | (45) |
| 得到穆彰阿的赏识..... | (45) |

| | |
|--------------------|-------|
| 为败象横生的朝政忧虑 | (49) |
| 冒死犯颜上书皇帝 | (52) |
| 第三章 以儒学练就湘军 | (63) |
| 一、踏上镇压天国的征程 | (64) |
| 丁忧回籍的兵部侍郎 | (64) |
| 墨绖出山兴办团练 | (67) |
| 意在建军的团练大臣 | (73) |
| 被冠以“曾剃头”的名号 | (76) |
| 二、以儒家精神相维系 | (82) |
| 用书生来带兵 | (82) |
| 招募村野山夫为兵 | (86) |
| 厚饷养兵稳定军心 | (89) |
| 三、志在能征善战 | (93) |
| 编制上的大胆设想 | (93) |
| 大力筹办水师 | (95) |
| 高度重视湘军训练 | (98) |
| 第四章 初试锋芒的湘军 | (108) |
| 一、攻心之战胜于实战 | (109) |
| 千呼万唤始出来 | (109) |
| 以《讨粤匪檄》为先声 | (112) |
| 出征时的麾下人马 | (117) |
| 二、胜败参半的初战 | (121) |
| 出师不利的靖港之战 | (121) |
| 咬牙立志徐图自强 | (124) |
| 逐太平军出湘 | (127) |
| 三、立显功却无以为赏 | (130) |
| 与绿营军合攻武昌 | (130) |

| | |
|-----------------------|-------|
| 受驱使却又被控制 | (132) |
| 鏖战半壁山与田家镇 | (136) |
| 第五章 在江西进退维谷 | (142) |
| 一、湖口之战后的困境 | (143) |
| 湖口之战败在骄躁 | (143) |
| 派胡林翼回援武汉 | (147) |
| 努力从泥沼中爬起 | (151) |
| 二、痛失塔齐布、罗泽南 | (155) |
| 攻九江塔齐布阵亡 | (155) |
| 胡林翼经营湖北 | (158) |
| 罗泽南于武昌毙命 | (162) |
| 三、三克武昌前后 | (167) |
| 获得一丝喘息机会 | (167) |
| 第三次攻克武昌 | (170) |
| 委军丁忧回籍 | (174) |
| 第六章 历尽艰辛方有立足之地 | (182) |
| 一、危难之时肩负重任 | (183) |
| 委军以后大彻大悟 | (183) |
| 江西战局的转变 | (186) |
| 再次踏上茫茫征程 | (190) |
| 二、游来荡去漫无定所 | (195) |
| 三河镇遭致惨败 | (195) |
| 没有成功的入川之行 | (199) |
| 先下安庆的战略决策 | (202) |
| 三、历尽艰辛终获实权 | (207) |
| 受任两江总督 | (207) |
| 以上制下高屋建瓴 | (211) |

| | |
|---------------------|-------|
| 北攻南守进驻祁门 | (214) |
| 第七章 坚定不移攻克安庆 | (221) |
| 一、在北援与西进的两难之中 | (222) |
| 北上“勤王”的忧虑 | (222) |
| 安庆城下无以西进 | (227) |
| 被困祁门的两江总督 | (231) |
| 二、重创陈玉成兵团 | (237) |
| 赤冈岭力歼刘玱琳 | (237) |
| 攻陷安庆大肆屠戮 | (240) |
| 庐州之战挫败英王 | (245) |
| 三、统领四省之军务 | (250) |
| 被皇太后所倚重 | (250) |
| 清除江浙异己 | (254) |
| 三路进兵天京的决策 | (258) |
| 第八章 天京城下忧心忡忡 | (264) |
| 一、谋取江、浙钳制天京 | (265) |
| 派兵进取浙江 | (265) |
| 组建淮军进兵上海 | (268) |
| “曲意笼络俾为我用” | (272) |
| 二、曾国荃冒进雨花台 | (278) |
| 多隆阿负气而走 | (278) |
| 天京城下进退两难 | (282) |
| 雨花台血战四十六天 | (285) |
| 三、合围天京形势的出现 | (292) |
| 亲自考察雨花台大营 | (292) |
| 破“进北攻南”之策 | (296) |
| 各路大军趋近天京 | (300) |

| | |
|------------------------|-------|
| 第九章 天京城内纵兵浩劫 | (308) |
| 一、天京城外调兵遣将 | (309) |
| 固若金汤的天京城 | (309) |
| 切断天京的生命线 | (312) |
| 天京城渐被合围 | (314) |
| 二、孤城之下困难重重 | (319) |
| 攻城与诱降并施 | (319) |
| 使其倍受困扰的粮饷 | (323) |
| 与沈葆桢反目为仇 | (326) |
| 三、将赫赫名城夷为废墟 | (331) |
| 不愿与人分食肥肉 | (331) |
| 荒郊悲雨，野陌凄风 | (335) |
| 所杀之人壅塞秦淮河 | (338) |
| 第十章 临渊履冰之惧 | (347) |
| 一、殊荣背后的奇忧 | (348) |
| 方山脚下李秀成被俘 | (348) |
| 东下江宁会审李秀成 | (351) |
| 为私利擅杀李秀成 | (355) |
| 删改《李秀成自述》 | (360) |
| 二、裁湘留淮的良苦用心 | (366) |
| 在朝廷防范敌视面前 | (366) |
| 推美让功持盈保泰 | (369) |
| 大刀阔斧裁撤湘军 | (373) |
| “重振”江南统治秩序 | (379) |
| 第十一章 “我是打擒无功之人” | (387) |
| 一、受命于危难之际 | (388) |
| 北上的原因 | (388) |

| | |
|------------------------|-------|
| 奉旨剿捻吉凶难卜 | (393) |
| 万难迅速出征 | (396) |
| 二、从点到线以静制动 | (400) |
| 以点制面重点设防 | (400) |
| 查圩以清根本 | (404) |
| 由点到线划河圈地 | (408) |
| 三、疑谤丛集回任两江 | (413) |
| 河防战略的失败 | (413) |
| 在波平浪静处安身 | (417) |
| 屡遭弹劾的钦差大臣 | (420) |
| 第十二章 从理学经世到洋务强国 | (429) |
| 一、兼收并用博采众长 | (430) |
| 躬身实践的理学大家 | (430) |
| 挽救风雨飘摇的统治 | (434) |
| “阿思本舰队”的思考 | (436) |
| 二、被人称作“近代化之父” | (442) |
| 揭开中国近代化的序幕 | (442) |
| “以为中国自强之本” | (446) |
| 全力推进“西学东渐” | (452) |
| 第十三章 一生“功名”毁于津门 | (460) |
| 一、对“同治中兴”的困惑 | (461) |
| “吏治人心为第一要义” | (461) |
| 为王朝未来命运而忧 | (468) |
| 二、“办理过柔，寸心抱疚” | (473) |
| 津民火烧望海楼 | (473) |
| 摆在眼前的棘手难题 | (478) |
| 独自吞下“诚信”外交的苦果 | (481) |

| | |
|------------------------------|--------------|
| 死于两江总督任上 | (488) |
| 第十四章 品性是事业成功的基石 | (494) |
| 一、传统的家教模式 | (495) |
| 倍加珍惜手足之情 | (495) |
| 在妻之外也纳妾 | (499) |
| “爱之以其道”的教子方法 | (502) |
| 二、“坚忍”、“拙诚”是立业之本 | (509) |
| 有极为高远的志向 | (509) |
| 时时严于自律 | (514) |
| 敬恕立身拙诚行事 | (517) |
| 三、“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 | (521) |
| “为清代第一流人物” | (521) |
| “汉民族的不肖子孙” | (526) |
| “不世出的哲人” | (527) |
| 附录一 | |
| 曾国藩家族史料 | (534) |
| 附录二 | |
| 大事年表 | (596) |
| 参考书目 | (621) |
| 后记 | (627) |

第一章

胸怀大志的青年

曾国藩是一个湖南湘乡家境较好的农家儿子，从小就受到了极其严格的“男必耕读，女必纺织”的家庭教育。在科举时代，曾家以往“寒门冷藉”，不想胸怀大志的曾国藩却年轻有为，二十七岁即科举得中。从此，开始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一、在“衰世”与“经世”氛围里

出生在衰落的清王朝

清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1811年11月26日),在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的偏僻小山村——白杨坪,一个拥有百余亩土地的地主曾玉屏家,迎来了一件喜事,其长孙来到了人世。这位初生的小儿,便是清代“四大中兴名臣”之一的曾国藩,别号涤生。

曾国藩的一生是与呈现“衰世”的清王朝相维系的。所谓王朝的“衰世”,主要特征是社会的基本矛盾亦即地主阶级与广大农民的矛盾异常尖锐,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封建的统治陷入异常深重的危机。历史动荡的岁月往往产生相反的两种结果。对于凡夫俗子来说,生长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时代里,只有慨叹命运不济、生不逢时;而对才能超群的人物来说,却是如鱼得水,遇到一个难得的历史契机,可以在历史舞台上大显身手。

清王朝在经历了“康乾盛世”之后,至道光、咸丰年间,早已埋伏于十八世纪末叶的社会危机,像火山喷发一样展现出来。

由于中国的人口从十八世纪以来,成倍地增长,导致了土地资源平均拥有量的显著下降。从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末,中国人口翻了一番,从1.5亿增加至3亿多⁽¹⁾,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增至4.4亿⁽²⁾。人口对于土地的压力,在这一时期明显地表现出来。根据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生产力水平,大约需要四亩耕地才能维持一个劳动人口的最低生活水平⁽³⁾。至道光年间,中国人均

土地占有量不足两亩，而在清代农业最发达的江南苏、松、杭、嘉、湖地区，生齿日繁，更是人多地窄。浙江杭州府于潜县，人均耕地仅0.64亩。人口的饱和状态，已由长江下游各省转向边远地区，“人多之害，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5]。四川盆地在明末清初人口聚减，十八世纪却吸引了大量的外来移民，早已人满为患，甚至东部山区也住满了难民。在多山、贫瘠的湖南西部，无地的外来移民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与当地的苗族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今中国生齿日繁，气象日益隘，自啖自肉，无受代者。”^[7]清代前、中期经济的日益增长与长期的和平，哺育了日益增长的人口，但顽固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却没有促使其出现新的发展。

土地兼并的加剧，更加促使农民失去土地，加深其贫困化。江南地区地主拥有的土地，甚至“分列数县版图”^[8]，长江下游地区，土地为“百姓所有者，不过十之二三”，其余十之七八“皆绅衿商贾之产”^[9]。在社会上出现了一批占田几万亩、十几万亩以至上百万亩的大地主。嘉庆四年（1799年）大学士和珅获罪抄家，被抄出地产80万亩；嘉庆十年（1805年）广东巡抚百龄有田50万亩；道光年间大学士琦善占田200余万亩。造成了“一人而兼数十人之产，一家而兼数十家之产”^[10]的社会现象。农民因地租、高利贷的剥削，有的从自耕农沦为佃户，有的失去土地，成为流民。恶性膨胀的地主阶级土地占有制，成为清朝社会危机的催化剂。

吏治的败坏，军队的虚弱日甚一日，催迫着清王朝向“衰世”滑落。与人口剧增，资源相对拥有量减少相联系，清代中叶以后，士人过剩的现象日益突出。士人的总数与人口成正比例增长，各级官职数却大体保持常量，而封建性的自然经济又没有可能把士子吸引到科学文化事业的广阔天地，读书人拥挤在狭窄的“仕途”上，而日趋腐朽的取士制度和官僚制度，致使贪污、贿赂公行。“清廷以捐纳卖官而培植贪污，以薄俸陋规驱使贪污，……

于是中国政府（清政府）无论在中央、在地方，均以贪污自私为其本份矣！”^[11]嘉庆帝虽然处死奸相和珅，惩办了一批罪恶昭著的官吏，但亦无力扭转这一腐败趋势。官场腐败日甚，直至道光末年无稍改变。吏治的败坏“虽痛哭流泪言之，不能尽其状。”^[12]统治集团的一味因循苟且，将就眼前，又纵容了吏治的败坏，“论治者以勤修政事为妄动，以坐听败坏为镇静”^[13]。号称“天下劲旅”的八旗兵、绿营兵也受到严重蛀蚀，战斗力大为削弱。嘉庆初年镇压白莲教起义，全靠各地团练武装追堵拚杀，军队已将“操练巡防，无不视为具文”^[14]。

统治阶级的腐败、虚弱和被统治阶级负担的日益加重，使社会的危机异常严重。嘉庆元年（1796年），川楚白莲教在“官逼民反”的口号下，首先在湖北荆襄地区发动起义，很快发展到四川、河南、陕西、甘肃。清政府征调天下的财力、物力，花费了九年的时间才将其镇压下去。这次起义成为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从此各地起义、变乱不断发生。清王朝的“太平岁月”已明显地走到了尽头。

本来，内政疲败，内乱频仍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由盛转衰的通则，而道光、咸丰年间愈演愈烈的西方殖民者挟坚船利炮、商品鸦片大举入侵，更造成一种旷古未见的“变局”。自从英国商人把鸦片作为解决贸易逆差的商品输入中国，使无数的中国人越吸越上瘾，市场愈来愈扩大，丰厚的利润使鸦片走私网遍及全国各地。这不仅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优势，每年流出大量的银两，使中国银源枯竭，引起财政危机，更重要的是，给中国人生理上和心理上以极大摧残，使得本来就已经腐败不堪的清王朝统治机器更加败坏。清王朝的被迫禁烟，触及了殖民者的利益，他们便诉诸武力，用坚船利炮，把战争的祸水强泼在中国头上，战争的结果使“老大帝国”以签订可耻的城下之盟——《南京条约》而告结束。鸦片战争是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把中国拉入世

界市场，变中国为其殖民地而进行的一场侵略战争。从此，殖民者纷至沓来，硬把中国拖入半殖民地的漩涡。

清王朝在固有的内忧和新至的外患双重煎迫下，风雨飘摇，大厦将倾。这种空前的社会变动，使一部分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士子惊觉起来。他们纷纷从古籍考证和玄学思辨中抬起头来，把眼光转向活生生的、充满矛盾的现实社会，转向中国人不曾了解、流光溢彩的外部世界。

时代对“经世”的呼唤

经世，也就是治世，在于引导人们经邦治国，建功立业。

“经世致用”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是千百年来士人赖以安身立命的信条。“古者儒墨诸家，其所著书，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盖未有空言无事实者也。”^[15]当然，经世意识的强弱显隐程度，在不同学派间存在着差异，很早便有“内圣”与“外王”两条发展路径。强调“内圣”之学的派别（先秦的思孟学派，宋明的理学）虽未有放弃经邦治国的目标，但“经世”意识愈益为个体修养及宇宙本体研究所淹没；而强调“外王”之学的派别（如先秦荀况，南宋的事功派）则以“隆礼”为职志，致力于“修实政”、“施实德”，高扬“经世致用”旗帜。同时，经世意识的强弱显隐程度直接受历史条件所左右。当社会生活平和，封建文化专制强劲，经世观念则往往被学术的外壳所隐藏，隐而不彰；到了社会危机四伏，国家民族面对纷至沓来的内忧外患时，文化专制有所松弛，士人的忧患意识便会大觉醒，其学术也在现实生活中被冲撞、磨砺，沿着经世的方向发展。经世意识的这种显隐变幻，在清朝表现得尤为典型^[16]。

清朝初年，在农民战争、清初统一战争的洗礼下，著名的士子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人，以匡济天下自命，力主黜浮崇实，在诸多学术领域里总结明王朝覆灭的教训，进而广泛